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兵法》战争智慧研究专题

中国革命战争中兵学之魂的再造

姚振文

(山东航空学院 孙子研究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在战争实践中充分运用了古兵法,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动了兵学之魂(兵学主要精神)的再造。其中,理念和信仰是兵学之魂的导向和牵引,谋略和智慧是兵学之魂的主体体现,而理性与哲理则是兵学之魂的深厚根基。这三者融而为一,共同形成了集中体现兵学主要精神的深层次文化心理结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战争;兵学之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兵法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cnki.1673-2618.2024.01.002

关于兵学之魂,可以有多个角度的理解。如有人依据孙子的全胜思想,认为“全”乃兵学之魂;有人考虑到战争变化莫测的特点,认为“变”乃兵法之魂;有人联想到谋略的辩证性和灵动性,认为“谋”乃兵法之魂;有人认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国安民,是为天道人心而战,主张“仁”乃兵法之魂。

在笔者看来,“兵学之魂”应该不是某种单一的思想或概念,而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精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其一,是理念和信仰(具体指仁本与民本),它是兵学精神的“导向”或牵引。其根本目的在于培育人们在战争中的道德感、正义感及良善情怀,以集结或汇聚战争的正能量,进而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合于人类生存延续的生命律动。

其二,是谋略和智慧,它是兵学精神的主体体现。人类的谋略丰富多彩,玄妙无比,其中,既有立足宏远的战略分析,也有出奇制胜的战术法

则,还有不可胜数的战法技巧。然而,所有的谋略又都离不开实战的沃土,唯有实战的检验和实战中的智慧才能真正塑造兵学之魂魄。

其三,是理性与哲理,它是兵学精神的深厚根基。兵法的运用,一定是基于科学理性原则,它必须面对战争的客观现实,进行冷静的计算与推测,进而在最大限度把握战争利害的基础上,做出最佳的目标规划和合理选择。当然,在处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战争领域,不断出现的偶然性因素也会使人们的理性计算走向失误和失败,故兵法又必须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为根基,亦即灵动的辩证法也要成为兵法之魂的有机组织部分。

然而,上述兵法之魂的内容是以中国古代战争环境和朴素的辩证法及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时至近代,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当民族复兴成为革命的主要目标,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风起云涌之时,古老的兵法也必然焕发新的生机,最终使兵学之魂注入新的内涵,实现新的飞跃。

收稿日期:2023-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重大项目“中国孙子学史”(2019-SKJJ-A-009)

作者简介:姚振文(1966—),男,山东邹平人,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先秦史与孙子兵法研究。

E-mail:bsyzw@163.com

一、理念与信仰

理念通常指思想,它与观念、观点、看法有密切关联,但又是超越这三者的东西,从本质上讲,它更接近于道理或真理。也正因如此,理念较之观念更容易使人们相信其绝对正确,也更容易成为人们的信仰。

从兵法谋略或军事学的角度讲,安国保民的人本理念是其核心和灵魂。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武道”,它是具有根本性的常理或常识。“武道之存在的必然性就在于:世间一切存在都是在复杂的系统中、在‘联系’中,在矛盾中、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抗阻中存在。于是其共存中某者的存在就总是一个有危险的、其生存总是受到挑战的、甚至是处在生死存亡的敌意和挑战中的存在。是故,守土之责,安国之命。兵由是生,军由是成。”^[1]从上述基本内容看,武道背后的战争虽然是暴力的、残酷的,但战争指导和战争研究又必然蕴含着深刻的仁本与民本理念。中国古人在这方面早已有深刻的认识。《司马法·仁本第一》有云:“战道:不违时,不厉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这当是古代兵家有关战争仁本理念的最早阐释。《孟子·梁惠王上》则云:“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这是儒家对民本战争观念的热切呼吁。

至秦汉之时,义战观念的丰富和完善更加肯定了仁本理念在战争中的地位。如《淮南子·兵略训》有云:“贪味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骚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除暴安民、以战止战,是要驱除人类之阴暗与罪恶,追求社会之和平与光明,此种伦理特色的战争观成为后人指导和研究战争的根本方向。

宋代范仲淹戍边西北,始终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和仁本情怀组织和指挥宋夏战争,他既以心系国家存亡、不忘百姓安危的将帅身份,坚持战争理性;同时,又以“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知识分子身份,展现儒

家学派“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的天下情怀。《宋史·夏国传》载曰:“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黷以武。”

明代王阳明立足“致良知”的哲学视角,强调将帅用兵的高层境界在于:“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2]。受此影响,戚继光在其建军与治军的过程中亦明确主张:“遴其有志于武者,群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诱,明其忠义,足以塞于天地之间,而声色货利,足以为人害,以正其心术。”^[3]

到曾国藩之时,更将战争领域的儒家仁本、民本理念发挥到了极致。王定安之《湘军记》讲:“原湘军创立之始,又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4]徐凌霄之《曾胡谈荟》亦讲:“湘军将帅多起自儒生,蹈厉奋发,视死如归,亦此种信念有以致之。”^[5]

当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像范仲淹、曾国藩这样能够真正将理念与事功结合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在近现代的革命战争条件下,可贵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一个千年巨变之际的先进革命组织,在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战争中,成功实现了信仰理念与事业事功的完美结合,进而使兵学之魂在诸多本质的观念和 content 上得到了升华和改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不乏家庭优越、智慧高超的优秀军事将领,他们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者,为此他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理想和信仰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封建士大夫的仁本和民本理念,同时也绝对超越了国民党蒋介石标榜的“黄埔精神”,所谓“服从校长、尽忠党国、精诚团结、成功成仁”。

共产党人的战争理念和信仰是为正义和远大的革命事业而战,为天下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而战,为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而战。这对每一个共产党人来讲,是潜藏于内心最深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即使面对革命道路中的重重挫折,他也会坚决走下去,即使面对革命行动中的天大委屈和困难,他也能完全忍受,这与《孙子兵法》中所讲的“令民于上同意”之“道”是有本质区别的。

史无前例的红军长征无疑是理念与事功结合的杰出典范。长征过程中,每支部队都度过了重重的艰难坎坷,每位战士都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然而,他们都顽强地坚持下来,最终实现了三军会师和战略目标的转移。因为这是一只用伟大理念塑造出来的革命军队。在党的理想信念教育之下,价值理性超越了功利理性,伟大信仰替代了高官厚禄和人生享乐。

解放战争亦是理念和事功结合的光辉范例。在国共双方的对战和较量中,力量弱势的一方不断取得胜利,而强势的一方却不断走向失败。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许多国军士兵本来消极厌战,战斗力很差,而一旦被俘虏后转化为“解放战士”,就会脱胎换骨,作战异常勇敢。这同样是理念和信仰的伟大力量!因为士兵在革命的队伍中,自认为自己已经是新中国的主人,他要承担起解放人民的历史责任,要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为家乡和亲人而战!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诠释了理念与事功的完美结合。中美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如此巨大,尤其是武器装备和后勤力量的对比更是天壤之别,但最终的胜利却属于中国。这是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战争经验的智慧火花也可以化解钢铁武器的铁血威力。当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正是携三年解放战争胜利之余勇,并依靠在腥风血雨中磨炼出来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斗争智慧,最终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大兵。将国家之命运托付于军队,将民族之命运交付于战士,每一位士兵就可以藐视一切、赴汤蹈火,每一支军队就可以所向无敌、战无不胜,这正是军人的武德,也是军队中的武道。

正因如此,在抗美援朝的每一个战场上,志愿军战士都能无所畏惧地面对敌人的现代化装备与猛烈炮火,第一批战士倒下,第二批战士义无反顾地跟进冲锋,之后还有连续冲锋的第三批、第四批,所有人都会英勇地跨过战友的躯体前进,直到最后夺取胜利。

长津湖之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冰雪覆盖的天地之间,夜间温度低于 -40°C ,这是常人根本无法忍受和生存的恶劣环境。然而,志愿军战士们穿着单薄的棉衣在冰雪中埋伏数日,喝

不上一杯热水,吃不上一顿热饭,困了卧着厚厚的冰雪而眠,饿了啃食冰冻的土豆充饥,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军人精神坚持下来,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总之,先进的理念背后会有伟大的力量,精神和血性有时候会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兵学运用得成功,首先在于它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这可以说一名将帅运用谋略的活的灵魂,也可以说是一支军队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有了这种理念和思想,将帅和士兵才会自觉、自信、自强;有了这种理念和思想,兵法谋略的运用才会有根、有花、有果。

二、谋略与智慧

谋略是指通过对眼前和长远的问题思考而制定的解决对策和方案。从军事文化的角度讲,中国人更注重谋略,西方人更注重技术,实为历史的传统。比如,《易经》以阴阳为逻辑起点,推演宇宙和自然规律,于阴阳互动中,处处隐含着谋略和韬略。老子的《道德经》在阐述道家哲学的同时,又以贵柔、守雌、主静、贵无、守弱等哲学思想为基点,创造了丰富的权谋策略。《孙子兵法》一书更是集谋略之大成,构建了近乎完善的谋略思想体系。

在战争实践中,谋略盛开的花朵就是兵学智慧,它常与谋略一起被视为兵学文化的主体性内容。所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战争谋略本就是最灵动、最奇异的主观辩证法,其经过实践的洗礼加上人类心灵之创造,又会不断演化为战争中的无限智慧,更加丰富多彩、瑰丽多姿。所以,孙子才讲“兵家之胜,不可先传”(《计篇》),岳飞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司马迁还有一句肺腑之言“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司马迁的话似乎更抓住了战争指导的本质问题。在战争中,任何理论都有明确的指向和固定的应用范围,而且许多条目都是经过精确量化的。而在战争实践中,战争活动永远没有固定的范围,其作战指挥也都是随机的、灵活的,故而,

从指挥谋略运用的角度讲,战争中的实践智慧实为兵法之魂,它较之相应的理论智慧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克劳塞维茨也讲:“事实上,天才所做的正是最好的规则,而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正是阐明天才是怎样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6]91}

在笔者看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其最大成功之处就是对实践智慧的高度重视和运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靈魂。党史专家杨奎松总结毛泽东的成功之道,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务实”。他说:“什么叫务实?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利字当头,一切从实际利益出发。当然,这里讲的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中共之利,或叫革命之利。换言之,就是不能从本本出发,不能从俄国人的经验或需要出发,甚至不能简单地从国家或民族的所谓原则或情感出发,一切都要从中共的实际利益,要从革命的根本利益来考量。有利则做,不利则不做。”^{[7]123}这种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务实观念和理性认知,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将兵学谋略转化为实践智慧的基本前提,也是对兵学之魂塑造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最早从战略实践层面解决了中国革命最首要的问题,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继而,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真正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方向选择问题,从而成为孙子“以迂为直”思想和间接路线战略的经典范例。在今天,我们都能很好地理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然而,在当时来讲,这却是一个异常艰难、“离经叛道”的转变过程,因为他背离了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和理论。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立足中日两国的国情和战争实践,深刻剖析了双方的长短优劣,进而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抗战必然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著名论断。《论持久战》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特别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他认为,日本由于兵力不足,必然在占领区留下许多空虚,因此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不是在内线配合

作战,而是要在外线独立作战,它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从兵法理论的角度分析,这两篇文章实际解决了两大根本问题:其一是中国人抗战的自信心问题,这是抗战胜利的政治基础;其二是解决了我军战略主动权的问题。敌人军事实力强,硬拼不行,那就只能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打敌人兵力少的软肋,攻敌人不能持久的弱点,这也正是孙子“避实击虚”和“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根本原则。

在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复杂现实出发,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英明决策。他说,如果要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用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脚下。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向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8]334}

战略之难,在于抉择。作为战略谋划者,他不需要为全局负责,也不需要为后边的成败得失负责,而作为战略决策者,则必须承担事后一切的风险和责任,因而决断者往往变得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进退失据,正所谓“三军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子兵法·治兵》)。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在朝鲜出兵决策问题上的英明与伟大。

正确的战略决策之后,战争目标的最终实现还要靠指挥员在战争过程中灵活应变的实践智慧。所谓“用兵之术,知变为大”,“变”是兵法的主要精神,也可以说是兵法谋略的靈魂。在用兵知变的问题上,曾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是杰出代表。

1947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对山东重点进攻的过程中,以整编74师为核心,部署了中心突破、两翼保卫的战术,逼迫我军与其决战。在此严峻的形势下,粟裕突然改变过去先打弱敌的打法,决定以五个纵队合围歼灭敌74师(另外四个纵队打援)。这一决定绝对是一个大胆而出奇的作战方案,因为74师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全

部是美式装备,战斗力非常强,如果其没有迅速被围歼而其他敌人又突破了我军防线的話,我军五个纵队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粟裕之所以还要实施围歼张灵甫军的计划,是因为他窥破和看准了74师的多个虚弱之处。其一,张灵甫急于立功,求胜心切,其主力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后续部队,但也确有孤军冒进之嫌;其二,张灵甫骄傲自大,刚愎自用,对被围缺乏应有的警觉(即使被围之后,仍自信满满);其三,张灵甫深受蒋介石的器重,与其他部队矛盾很深,尤其是与李田霞的矛盾最深(部队距离他最近),这很可能造成敌人救援不力;其四,张灵甫军装备虽好,但在山区无法有效展开,优势难以发挥。

孙子论述避实击虚有一个重要思想,即“先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篇》)。此时的张灵甫军恰恰就是敌人整体防御之“所爱”(既是敌方军事体系中心,又是弱点),所以围歼它并不违背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战役开始后,粟裕指挥第9纵队迅速占领坦埠,防止敌人突破,继而又严令潜伏鲁南的第6纵队迅速占领垛庄,断敌退路。最终,在狭小的孟良崮区域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历史罕见的战争奇局:我军将74师从敌人集群中分割出来包围(陈毅称之为“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敌重兵在外围包围我军。这场战役历时三天结束,敌74师三万多人全部被歼,敌人鲁中决战计划也彻底破产。

此战充分显示了粟裕善于深谋远虑而又大胆、灵活、出奇的作战指挥风格,也充分体现了传统兵法思想在革命战争中的创新性应用。其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兵法知识与兵法谋略都是外在的东西,作为战争指挥者不应刻板地遵守这些外在的规则,而是应该用弹性的心灵实现新的创造,将古人的经验和理论全部地融会贯通,进而变成战场上的实践智慧。

三、理性与哲理

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他有理性。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人类正是借助于理性,才创造了文明与科学,并增进了人类本身的福祉。西方学者斯奈德教授曾对理性做出这样的界定:“首先对于可能的得失,以及敌方行动的几率作冷静的计算,然

后再根据计算结果来选择一条对于自己可能最为有利的行动路线。”^{[9]25}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中的理性是最为成熟的。在我国商周之际,随着个体经验活动的积累和社会的政治变革,人们的理性已经不断加强,尤其是集体性的军事活动最集中地体现了理性精神,人们对于战争性质和规律的认识也更加深刻。这是因为,战争与生存、生命以及荣誉直接相关,最具有功利性,也就最能促进人们对现实活动的反思和醒悟。也正因如此,春秋之际的兵法和兵学遂成为先秦理性精神的主源头。

李泽厚先生是这样总结战争理性的:“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替代或影响理性的判断和谋划。”^[10]只有在战争中,只有在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采用战术中,才能把人的这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发挥到充分的程度,才能把它的巨大价值最鲜明地表现出来。^[10]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军事观念的传入及军事技术的改进,战争中的理性精神更加受到重视。前边提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具“务实”风格,这本质上就是理性精神的表现。那么,在风雨变幻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人是如何以理性精神为前提,将兵法谋略融于战争,又是如何以辩证哲理为基础,再造和重塑了兵法之魂呢?

这首先是一个辩证认识 and 对待利害的问题。战争战略决策要以“利”为基本依据,此乃战争理性的重要体现,因为,人之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然而,在战争现实中,人们对利害的理性抉择又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利”与“害”的界限是很容易混淆的,而且“利”与“害”的实际结果也不是马上可以显现的。

真正高明的决策者是要能在复杂的形势面前辩证地认识和选择利与害。曾国藩曾言:“就全局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根本。”^{[11]346}西方腓特烈帝则说过:“平庸之人想保住一切,而理智者只关注主要事物。”^{[12]145}这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孙子的一句话:“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

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

什么都想保住的人必然什么都保不住,这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有血的教训。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之时,国民党组织重兵进攻中央苏区,“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然而,红军浴血奋战的结果是:拥有70多个县的中央根据地只剩下了6个县,中共中央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长征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舍得放弃,结果湘江一战,吃了大亏,红军由10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战争用它最残酷的方式证明了理性精神的重要性。毛泽东对此总结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13]484}

毛泽东无愧为自觉而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他不仅能辨识利与害,更能够结合现实情况及时地将大害转为小害,将不利转化为有利。比如,长征途中土城战斗因情报错误而失利,但毛泽东却能审时度势,果断退出战斗,然后导演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再如,皖南事变使新四军主力遭受重创,但毛泽东却能借此发起政治攻势,不仅重建新四军军部,而且使新四军力量迅速扩展至大江南北。

从上述内容看,辩证哲理与战争理性又是同为兵魂之基的。也就是说,兵学之魂塑造要基于现实理性,同时还要基于辩证思维的深刻哲理。这其中的原因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在战争目标规划中,科学理性自然是规划的基础,但将帅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又不能不考虑偶然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任何共产党人或革命领导人也是凡人,他们经常会受到主观经验或心理动机的影响,而辩证思维具有“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活动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10],因而能够更好地克服由于非理性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其二,战争本身就是一种活力对抗,近代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各种要素和形势也更加复杂。这就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做出抉择。所谓概括性的二分法

的思维方式,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从而便于掌握住事物的本质。”^[10]

其三,战争谋略活动的无穷奥秘与战争指挥者的巧妙艺术无不来源于这种辩证性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活动。以四渡赤水为例,它实际上是基于辩证哲理活用了孙子的奇正、虚实、迂直等思想。你以为我会去这里,我却偏要去那里;你以为我要出正兵,我偏偏要出奇兵。总之,一定要敌人猜不透,料不到。凡是意料不到均无法做出有效的准备,而我方就可以出其不意而攻之,进而取得战争的最佳效果。此种辩证思维的运用,体现在毛泽东这样的伟人身上,会更加达到玄妙的境界。

四、结论

中国革命战争中创新运用兵学谋略的实践过程,也是传统兵学思想转型嬗变的过程。在新的革命环境中及相应的条件下,传统兵家智慧固然会在学习和继承中“随风潜入夜”,但对一切以实事求是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却又有更多的创新和改造。

从战争观层面讲,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特色的伦理战争观念,又将新的解放劳苦大众、以民为本的思想融入革命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中,从而创造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战争观。

从战争指导层面讲,中国共产党人立足革命战争的实践需求,将传统的兵学谋略运用于战争指导过程中,将兵学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与求真务实、人民战争的新特点充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战争指导思想体系,并使传统的兵学智慧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从战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讲,注重务实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传统的实用理性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相结合,从而奠定了新型革命战争理论的科学基础和哲学根基。

总之,中国革命战争中兵学之魂的再造,既包括为天道人心而战的人民性,又包括丰富谋略与实践智慧的玄妙性以及现实理性、辩证哲理基础上的灵动性,这三者会通融合为一体,必将创造出中国军事思想的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 [1]张光成. 兵学文化刍议[J]. 传承, 2009(4): 150-151.
- [2]张新民. 阳明精粹[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
- [3]戚继光. 练兵实纪[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 [4]王定安. 湘军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
- [5]徐凌霄, 徐一士. 曾胡谈荟[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
- [6]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 [7]杨奎松. 谈往阅今: 中共党史访谈录[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毛泽东军事箴言: 下[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
- [9]G.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 [10]李泽厚. 孙、老、韩合说[J]哲学研究, 1984(4): 41-52.
- [11]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奏稿[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6.
- [12]戴耀先. 德意志军事思想研究[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9.
- [13]张学新, 王之望.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实践大观[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l of Military Scienc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War

YAO Zhenwe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n Tzu,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Wa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led by Mao Zedong not only fully used the ancient art of war in military practice, but also promo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l of military science (the main spirit of military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Among them, ideals and beliefs are the guidance and traction of the soul of military science, strategy and wisdom are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the soul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reason and philosophy are the profound foundation of the soul of military science. These three parts are integrated into a whole, forming a deep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that embodies the main spirit of military science.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War; the soul of military science; Marxism; ancient Chinese art of war

(责任编辑: 许 金)